

导论 西方社会学的历史 背景与理论构架

个人是与人类整体不可分割的，是其中活生生的一分子。……他不能脱离人类整体；遗传和教育因素已经构成了他的生命。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每一个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给整体生活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美] 查尔斯·库利

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和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英] 安东尼·吉登斯

我们在这部将由三卷本构成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的开篇处，之所以引用了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和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两段话，是因为它们都涉及到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其实，无论是库利还是吉登斯，在表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方面，都有过更为简洁的表述：库利作此论述的那本著作的标题是“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这等于划定了社会学的论域是由“行为（微观）和“结构”

(宏观)两个方面构成的;而吉登斯则干脆说过,社会学是有关现代性的研究。^①

从表面上看,库利和吉登斯的各自表述及他们对社会学学科对象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是,仔细研究能够发现吉登斯颇具个人特色的表述和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库利的表述之间并非不可调和。以吉登斯为例,一方面,他不断地鼓吹社会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或者说社会学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共生的现象,其目的就在研究现代性及其后果;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吉登斯也一再申明社会学应当承担起将“行为”与“结构”联系起来的任务。^②因此,可以说,在吉登斯那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性与社会秩序,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他强调的只是人类有关自身行为及其发生场域的研究之所以会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是与在此之前开始发生的人类历史进程的“断裂”或曰“现代性”的出现休戚相关的。正是这种“断裂”或者说正是自17世纪起出现的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首先在欧洲随后在世界各地使得人性和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变化。我们不久就会看到,那些被称之为“社会学先驱”的思想家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比其他人更为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全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比如圣西门就首先创用了今天已经十分流行的“工业社会”的概念;而我们在本卷中将具体阐释的那些经典社会学家,则大多以类似韦伯的类型学分析,将“断裂”前后的社会形态分为名称各异的两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曼恩那里称为“身份社会—契约社会”在斯宾塞那里称为“尚武社会—工业社会”在马克思那里称为“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滕尼斯那里称为“社区—社会”在托克维尔那里称为“贵族制—民主制”在迪尔凯姆亦被译作“涂尔干”那里称为“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在韦伯那里称为“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

^① Giddens, Anthony, *Sociology*, New York: Norton, 1988.

参见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在库利那里称为“首属群体-次属群体”在索罗金那里称为“亲密关系-契约关系”……直到社会学诞生 100 年之后，还是有许多社会学家仍在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将社会作类似的类型学划分：如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市民社会”贝克尔的“神圣社会-世俗社会”以及费孝通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现代性的出现，或者说没有因现代性的出现而造成的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巨变，就不会激发这些思想先驱们去思考这种“断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社会学当然也就无以产生。

尽管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具体讨论社会学是什么，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将“人性与社会秩序”尤其是这两者因现代性的出现而发生的剧烈变化，确定为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会影响甚至决定我们对这部著作的历史进程和具体论述的选择。在这样的架构下，我们能够看到，早期的社会思想和后来的社会学思想的区别恐怕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1）早期的社会思想探讨的是人性与社会秩序的普遍关系，而后来的社会学思想关注的则是工业社会，或因工业社会的到来而造成的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巨变；（2）正是因为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使得社会学家们有可能从新兴的自然科学中获得借鉴，以一种不同于人类早期先哲们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探讨人性与社会秩序。如果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就能够看到，整个社会学中宏观传统和微观传统的分野，其实就表现在社会学家是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人性”还是放在“社会秩序”之上，是认为人性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或不断建构着社会秩序，还是社会秩序派生或不断塑造着人性。我们同时还能够看到，社会学中各种不同的范式以及范式间的对立与交替，既与人们在何种层面上讨论“人性与社会秩序”问题以及对这两者的关系给予的具体解释密切相关，也与人们对现代性及现代性的后果的理解不无联系。比如，“后现代社会学”这种新的理论范式的出现就是后现代性或现代性的反思的直接结果。因此，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社会学和现代性的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社会学既是对自 17 世纪开始延续至今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及结果的理解与阐释，同时其本身又是这种迅捷的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已经说明，尽管从人类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天起，就在结成

丰富的社会关系 展示救助、合作、亲情、欺诈、剥削、侵犯这些称之为“人性”的不同侧面的同时，开始了对自身行为和社会秩序的思考，但是，将这种思考与一般的对自然和社会过程的思考区分出来，并用特定的经验方法加以分析，则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事。这种说法意味着，一方面人类对人性和社会秩序的思考不是近一二百年来才有的事，它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动尤其是因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而导致的人性和社会秩序的日益复杂化，或曰现代性的出现，则使得后来者有机会也有可能以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方式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加以新的思考。这样一种事实使我们虽然没有必要花过多的篇幅像哲学家或政治学家那样去论述奥古斯特·孔德之前的思想家们的贡献，但了解这种贡献的背景和意义，以及近代以来这种贡献怎样在来自变动社会的力量的推动下孕育了一门新的学科的诞生，则是公正而有益的。

一、思想遗产 从古代希腊到 18 世纪

当我们为今天已十分庞大而自成一体的社会学思想开列其所继承的遗产清单时，应首推古代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学生，但师生两人无论在基本观点还是在性格、气质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一开始就赋予了从古至今的社会理论的多元品质。

柏拉图（前 427—前 347 年）不仅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古代希腊哲学家，也是第一个留下关于社会研究的系统著作的人，以致有人认为“出身于雅典贵族阶级的柏拉图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学的实际奠基人”^①。

柏拉图是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尽管后者有关知识和理性能够使人摆脱恶而追求道德生活的见解促成了柏拉图建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蓝图——“理想国”^②，但他却完全背离了苏格拉底关

① W. D. 珀杜等：《西方社会学——人物·学派·思想》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34 页。

②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47 页。

士多德认为“社会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而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①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政治或城邦或国家是社会的同义语，因此他会说“人是政治动物，天性趋于与他人一同生活”，并且“人是为了成为公民而生的”。^②这些论述所欲表明的中心思想是，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具体说来，一方面，人类具有合群的本能，需要过社会生活，而人的这一本能只能在城邦或国家中充分实现；另一方面，城邦或国家又是人类本性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目的就是要保证人类本性的充分实现。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不难发现构成后来的社会契约论的那些基本的理论要素。

实际上，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决不限于上述有关人性和社会关系的讨论，“现代社会心理学许多有关态度和劝说的研究是与亚里士多德直接联系着的，他将这些内容归入了修辞学”^③。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释的人类社会行为的交换论观点称得上是现代交换论的滥觞；而他对自由民中中等阶级能够平衡富有和贫穷阶级的论述，同样使当代从事中产阶级研究的社会学家受益良多。

以希腊哲人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时代以后，开始进入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状态。尽管先是通过亚历山大帝国，后是通过罗马帝国，希腊文化被传播到地中海沿岸直达欧洲和不列颠，但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中能够传给后世的杰出思想是十分鲜见的。

当然，事情常常会有例外。自中世纪中期开始，因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加之教会与当时的封建体系的日渐融合，产生了将天国和尘世、教会与世俗政权以及天启和理性相互调和的需求。基督教神学在系统化和哲学化的要求的推动下，开始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而后者的社会哲学自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流传。这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②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67b, 1097b.

③ Sahakian, William, *History and System of Social Psycholog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2, p. 13.

于完善的人性和民主的社会秩序的观念。造成这种背离的直接原因是苏格拉底的死。在柏拉图眼中，民众正是借民主的幌子把苏格拉底送上了断头台；但其背景原因恐怕还有柏拉图的贵族出身，这种出身使他深信从事政治活动是贵族的特权。

柏拉图对社会的天才见解是由两个互为支撑的假设构成的：第一个假设是社会与有机体的类比，他将社会看成是一个类似于自然界的各种成分相互结合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体现了智慧最高的统治权力。国家是放大的个人，而个人则是缩小的国家。一如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理性、意志和情欲三个方面，作为放大的国家一样也有这样三方面的需要。国家的这些需要要求有三部分人来分别给予满足，由此产生了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分工。

和上述假设相一致，接下来柏拉图的第二个假设是，人生来就不平等，禀性有高下之别，这种差异构成了等级制的劳动分工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并因此满足了前述社会或国家的不同需要。在柏拉图的国家蓝图中，社会由统治者、保卫者和普通劳动者三种人组成：俊杰贤能智慧出众者应担负治国重任；勇气十足、强悍善战者应使之保卫国家；而俗人则应从事农工生产。^①这种分工是符合天性的，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这种方式工作，则国家将获得最大的利益。

柏拉图的长处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社会是一个由分工组成的功能互补的系统，并论证了分工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相互需要以及能力的差异。但是，柏拉图对社会的论述是混同于其对国家的论述的，因此社会职业分工的合理性就自然会被用来证实国家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同人文色彩浓厚且喜好编写国家传奇的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年）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品质。进一步地看，如果说柏拉图的社会思想大多来自其天才的假设和推演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则主要来自经验的归纳。在亚里士多德卷帙浩瀚的著述中，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是他关于人的本性和社会关系的论述。亚里

样，在最后的也是最杰出的一位经院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年）那里，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社会观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兴。面对用亚当和夏娃的原罪来说明人类起源的苍白无力，阿奎那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同意“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或者说社会起源于人的本性。这是因为“他有许多需要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他就不得不过社会生活——这一事实又必然产生另一个事实，即：人天生注定要构成一个使他能享受圆满生活的社会的一部分”^①。尽管为了符合神学体系的需要，阿奎那又认为人性或人的理性出自神的安排，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人性、个人与社会或国家的关系作出某些天才的猜测。这些猜测虽然具有浓厚的神学背景，但也如实反映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②

西方近代历史的帷幕是由文艺复兴及其后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拉开的。13 世纪从意大利首先开始而后向北蔓延的文艺复兴运动，在雅各布·布各哈特眼中是对当代社会形成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一个特别有创造性的时期，^③这也是恩格斯所说的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阐释的社会思想重新复兴的意义上说，意大利人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 年）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第一位巨人。

马基雅维里出生于作为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之地的佛罗伦萨，年轻时曾大量阅读西塞罗的著作，并熟习拉丁文、意大利古典文学和史学，以及古罗马政制和西塞罗等人的论辩和社会哲学。他一生著作颇丰，而给他带来声誉同时也招来恶名的是一本小册子：《君主论》。

马基雅维里的声誉来自他的政治见解。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见解在国家观上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说明马基雅维里“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的”这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 所剩下的是独立的研究政治

①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4、155 页。

② Szaeki, J.,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9, P. 22.

③ 布各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的主张……”。^①可以说，正是这让政治学与伦理学彻底分家的主张，使马基雅维里获得了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的称号。

为马基雅维里招来恶名的是他在《君主论》中阐释的“政治权术主义”或称“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是自私的，是无法摆脱暗杀、欺诈和背叛等堕落倾向的；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自然只有凭借外在的权力和力量，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同时，个人也只有生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治的社会里，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他人侵犯。基于此，马基雅维里自然强调社会高于个人，政治高于道德。政治致力于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而为了达此目的，政治家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②为此，用马基雅维里自己的话说，他放弃了 15 年的玩乐时间从事治国之术（即后人所称的“霸术”）的研究，为统治者统治百姓出谋划策。如果排除其动机的考察的话，可以说这是有关如何控制人类行为的最早的系统见解。

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欧洲继续经历着越来越广泛的变革。在自然科学领域，17 世纪开始的以培根为标志的科学革命“扬弃了经院主义的哲学态度和炼金术的虚伪欺骗之道，以由实验支持的大众研究取代了精密数学的正规研究”^③；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此时由荷兰法学家格劳修斯倡导的社会契约论开始获得欧洲大陆诸多学者的认同，此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英法思想家都是这一理论的积极推动者。

尽管社会契约论者的目的都是解释人类为何以及如何组成了一个公认的系统，但他们给予的解释则完全不同：继承了马基雅维里观点的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 年）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这使得前社会时期的人处在一种相互冲突和对立的状态中，而人们达成契约组成社会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冲突以及相互间的威胁和恐惧。^④同霍布斯将前社会状态的人类视为反社会的不同，他的同胞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68 页。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85—86 页。

黎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4 页。

④ Hobbes, T.,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hapter XIII.

翰·洛克(1632—1704年)则认为前社会状态下的人是无所谓恶与善的。因此,在前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们之间不必是对手,当然更不存在人类的混战状态。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人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人们身上所背负的种种限制是在他们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① 社会和政府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社会契约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公民授予权力和政治控制形成的。最后,在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者、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坚人物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那里,不平等是一种罪恶,而契约则成了解决这种罪恶的可行方法。^② 其实,单单是卢梭对不平等的起源、形式和后果的论述,也使他有足够的理由获得在这里得到论述的资格,因为“他清楚地看到阶级和阶级冲突的存在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构成了影响”^③。

写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跨进了18世纪的门槛。在这个世纪的风景框里,我们有机会去进一步考察那些和卢梭同时代甚至稍稍早于他的那些欧洲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因为认识到“社会是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在分析时应同政治社会区分开来的各种制度与过程的动态结构、并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过具体规定……”而被我们称之为社会学的先驱者。可以说,社会学正是在18世纪后,在来自变动社会的推动下,经由这些先驱者的直接努力而成为一门富有勃勃生机的新兴学科的。

二、先驱者的贡献

如果说奥古斯特·孔德因为在1839年首先使用“社会学”一词而简化了有关社会学创始人的纷争的话,那么对于“谁是社会学的先驱

洛克:《政府论》下卷 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第59页。

① 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律出版社 1958年版 卢梭:《社会契约

② 论》 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③ Donini, A. & Novack, J. (edited) , *Origins and Growth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Readings o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 Chicago: Nelson-Hall Inc. , 1982, P. 34.

④ 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 第3页。

者”的回答则远没有这样简单。按孔德本人的说法，直接促成他提出社会学概念的，是孟德斯鸠（1689—1755 年）和孔多塞（1743—1794 年）^①；而他同时又将其“与圣西门（1760—1825 年）合作的一篇宣称可以和必须建立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论文誉为‘1822 年的发现’”^②。而在其他社会学史家那里，能够拥有“先驱者”桂冠的人选则各不相同：英国学者艾伦·斯温杰伍德说“社会学的先驱乃是乔巴蒂斯塔·维科和巴隆·德·孟德斯鸠”以及亚当·弗格森；^③法国的雷蒙·阿隆认为应该将孟德斯鸠作为先驱者甚至应该作为社会学家来研究；^④现在十分走红的乔治·瑞泽尔也同意圣西门是和孔德、迪尔凯姆一样重要的社会学创立者；^⑤最后，美国社会学家多尼尼和诺瓦齐则提出，“孔德对这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最大的贡献，是将他那个时代所流行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系统整合 其中包括维科、孟德斯鸠、休谟、孔多塞和圣西门的思想……”^⑥。

这里没有必要对上述思想家的先驱者身份做逐个的审视，我们只要看到，在孔德正式创立社会学之前，确实已经有许多先驱者为这一学科的出现作出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贡献。如果要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话，维科、孟德斯鸠、弗格森和圣西门是我们不能遗漏的。我们也许可以将这四位思想家称作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先驱。

作为社会学的先驱者，首先应当论及的是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乔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 年）。这个出身寒微的学者在成年之后最初以当家庭教师维持自己的生计，其后在那不勒斯大学讲授修辞学达 40 年之久。1725 年，维科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 18 世纪初期最重要的讨论社会思想的著作《新科学》。这本书对人类文化的演

① 参阅王养冲：《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 页。

② Faris, R. (edited), *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4, P. 914.

③ 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 6、24—25 页。

④ 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20—21、60 页。

⑤ Ritzer, G., *Sociological Theory*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6, P. 13.

⑥ Donini, A. & Novack, J. (edited), *op. cit.*, P. 2.

进、财产和宗教的起源，以及语言、艺术与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出色的探讨，以致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本著作和其后出版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在把社会作为有机体整体进行理论概括，以及在把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及制度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起来方面，均堪称最早的重大尝试”^①。

在《新科学》一书中，维科尝试着用古代埃及人的方式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与此相应，在神的时代出现的是神治的政府，人们深信神是发号施令的主宰；在英雄时代出现了英雄或贵族专政的政府，他们以超越平民的优越感而成为统治者；最后，在凡人时代出现的则是人道的政府及君主政府，此时人们根据经验进行理性思辨，承认相互之间的平等，并建立了公民所适用的法律。维科深信“凡是国家政权都要符合被统治的人民的本性”，^②所以他认为人道政府或君主政府是最好的政体，从神的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凡人时代体现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其实，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维科同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人性和社会都是可变的，人类社会是历史的，社会制度和人的关系都是行动的产物。

我们已经提到在《新科学》出版不到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虽然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关于孟德斯鸠堪称第一位社会学家的观点未获得公认，但从孔德和迪尔凯姆起大多数人都认为将他视为先驱者是不应该有争议的。^③美国社会学家 I. M. 蔡特林在评论孟德斯鸠时指出：“虽然人们将某种思想的诞生归于某个特定的思想家的做法常常注定要出错，但孟德斯鸠却因为下述诸点而可以被视为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先驱者：他使用了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概念并使法具备了比其前人或同时代人更多的内在一致性；他理解到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他还发展了社会的成分在功能上是相互

① 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7页。

② 维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③ Durkheim, E., *Montesquieu and Rousseau*,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依赖的观点。”

其实，孟德斯鸠对社会学思想的贡献远不止上述诸点。这位出身贵族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前述意大利人维科一样，是较早使用历史主义观点从事研究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和一般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不同，他采取了社会唯实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超越个体集合的整体结构，并且有着自身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由此，社会的法律虽然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但却必须根据自然条件和社会制度而因地制宜，立法者的作用是使某种‘理想的’法规要求同‘环境’相适应而不是随心所欲。在迪尔凯姆看来，孟德斯鸠的这一见解对社会学的发展极有价值：因为如果认为法律仅仅只是立法者主观意志的体现，就等于否认“人类社会有任何既定的秩序 而如果这个看法能够成立 法律、惯例和制度就不是由国家的恒定性决定的，而是由谁掌握立法权的偶然性决定的”^②。

孟德斯鸠在共时态的层面上对作为整体结构的社会的论述是出色的。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只有从整体角度看才有意义的系统，这个系统不取决于某个单一的因素，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孟德斯鸠开列的影响人类行为的要素清单包括气候、宗教、法律、政治准则、道德和习俗……。不过，社会的异质性表现在“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些因素中如果有一个起了强烈的作用，则其他因素的作用便在同一程度上被削弱。大自然和气候几乎是野蛮人的惟一统治者；中国人受风俗的支配；而日本人则受法律的压制；从前风俗是拉栖代孟的法则；施政的准则和古代的风俗，在罗马就是规范”^③。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在开列了上述清单之后，又进一步从社会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出发，提出上述要素形成了一个国家的普遍精神。从孟德斯鸠的具体论述来看，我们同意阿隆的推测，孟德斯鸠的普遍精神“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所说的一国的文化，即某种生活方式和共同关系的形式”^④。

① Zeitlin, I. M., "Montesquieu (1689—1755)", in Donini, A. & Novack, J. (edited), *op. cit.*, P. 46.

② Durkheim, E., *op. cit.*, PP. 11—12.

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 305 页。

④ 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 45 页。

和任何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孟德斯鸠也有跛足的一面。如果说孟德斯鸠在作共时态的社会研究时是一个巨人，那么他在作历时态的社会分析时则是一个矮子。尽管孟德斯鸠对社会类型进行了出色的讨论，但他却忽视或无力对一种社会形态演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方式作出解释，所以他的理论并不包括有关社会变迁的看法。这样的局限在两方面影响了孟德斯鸠：其一，静态的形式分类使得他的历史分析是不彻底的；其二，还是这种静态的社会观使他不相信社会进步，同时在政治上不能不趋于保守和反动。^①

值得庆幸的是，孟德斯鸠的思维盲点不久就在大卫·休谟(1711—1776年)、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亚当·弗格森(1723—1816年)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那里获得了修正。这些思想家虽然也像孟德斯鸠那样强调社会现象的结构性，但同时也看到了不同的社会类型之间的转化。换句话说，他们的研究早已介入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变迁”的领域。尽管限于篇幅我们只准备论述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思想，但却有必要将另外两人简略地提上一笔。休谟不仅因其对人性的论述而对社会心理学有着更为明显的贡献^②，而且提到交往是人性的产物。亚当·斯密则不仅通过“看不见的手”在表达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秩序观的同时暗示了一种社会过程的历史决定论，而且天才性地预见到社会能够作为个人控制自己行为的镜子而发挥作用^③。他的“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实际上是我们在本卷末尾要谈及的库利的“镜中我”(looking-glass-self)和下卷要谈及的乔治·米德的“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雏形。

单就把握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而言，苏格兰学派的后来者亚当·

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58页 第61页。

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0页。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对社会作为个人行为之镜的功能作过出色的描述：“一个人如果不和同类发生交往，……不会想到自己的情操和行为的适当与否；不会想到自己心灵的美与丑，就像他不会想到自己容貌的美与丑一样。……但一旦到了社会中，他就会获得其所需要的镜子”(Adam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Routledge, 1911, P. 192.)。

弗格森留给我们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可能更多。他在 1767 年出版的《市民社会史文集》曾被龚普洛维奇誉为“第一部关于社会的自然史”，是 18 世纪颇有影响的著作之一。^①这部著作关心的不是重建以往的事件，而是“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从一种类型变为另一种类型的原因”^②。弗格森将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社会、野蛮社会和精致社会。有意思的是，弗格森同其他苏格兰学派的学者一样，在对原始社会和野蛮社会的研究中抛弃了当时的人们对野蛮人生活所具有的种种浪漫的猜想，他断言野蛮人并不比文明人更自然、更幸福。人类从原始社会到野蛮社会再到精致社会的过程是进步的历程，其中工业方面的变革是一切进步的源头。

当然，天才的弗格森并不对社会进步抱以简单的乐观主义态度，相反，他比其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社会尤其是工业方面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一方面弗格森看到了分工及由分工造成的社会分层是现代社会的整合要素（这与迪尔凯姆对分工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了由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等异化和非人化的后果。我们在他的《市民社会史文集》中能够看到与后来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的观点：“凡是工业……十分发达的地方，那里的人就最无须用心，那里的工场无须想象便可视为一架机器，而人则是机器上的零件。”

当我们从苏格兰再度回到法国时，取景的镜头已经伸进了 19 世纪。19 世纪是西方社会学诞生的世纪，但在社会学正式获得出生证之前，为她呕心沥血的还有一位思想先驱，这就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巨擘圣西门（1760—1852 年）。尽管这位 16 岁就在美国投身北美独立战争（1776 年）并因此曾遭英军拘禁的战士，获释返回法国以后一直是革命的拥护者，但却常常希望社会能够恢复旧有的道德。圣西门的双重

① Cf. Szacki, J., *op. cit.*, p. 76.

② 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 18 页。

③ Ferguson, A.,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82—183.

属性使得保守的孔德和革命的马克思都能从他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前者从圣西门那里获得了维持秩序的幻想，而后者则从圣西门强调社会阶级的工业社会观中获益良多。^①

恩格斯曾说过，“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②。作为革命之子，圣西门自然会特别关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尤其是以消费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向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像维科、弗格森一样，他也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准备工作时期、臆测体系组织时期和实证体系组织时期，而这三个时期是同人类理性发展的三个阶段相适应的。这三个阶段分别是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经过这三个时期的嬗递，就是他所设想的工业社会的到来。其实，如前所述，圣西门本人就是现在极为流行的“工业社会”一词的创用者。为了说明在工业社会的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倾向，圣西门甚至论证说，国家机构对生产需要和新兴的社会阶级来说是寄生的和敌对的。工业社会不应再以中央集权为基础，而应以市民社会组织为中心。因此，包括企业家、农场主、银行家、商人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实业家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宰，他们是“有益物品的生产者，是社会上惟一有用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引导社会的发展”^③。

除了与工业社会相连的社会发展观以外，圣西门留给社会学尤其是留给最终与他翻脸的秘书孔德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他关于科学的实证设想。^④在 1807 年出版的《19 世纪科学工作引论》一书中，圣西门首次创用了具有实证主义意义的“实证的”(positif/positive)一词，强调科学应该是实证的，这样它就能够通过其预测和证实原理而成为实

① Ritzer, G., *op. cit.*, P. 13; 另见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 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409 页。

③ 《圣西门选集》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第 210 页。

④ 迪尔凯姆认为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应该是圣西门而不是孔德，因为他提出了“扩展到社会科学中并派生了社会学的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历史的方法……，宗教改革的观念，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想”。(Quoted in Raison, T. (Ed.),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Social Science*,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0, P. 27.)

践的基础。十多年后他又在《论实业制度》(1821年)一书中说“社会也能够并且应该按照科学的实证原则去组织，以此达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彼此和谐运行。另外，也正是圣西门首先使用了‘社会生理学’和‘社会物理学’这两个概念，而我们知道幸运的孔德正是通过后一个概念‘孵化’出了自己的‘社会学’概念。”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无情不仅表现在岁月本身对人的行为痕迹的冲刷，而且也表现在后来人因不同的需要而对历史所作的无情裁剪。当我们即将完成对西方社会学产生前的社会思想史的论述时会发现，在我们的论述中同样无情地遗漏了许多对社会学的出现有过这样或那样贡献的思想家。单就对孔德创建社会学有影响的欧洲思想家而言，被我们遗漏的就有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杜尔阁和孔多塞，以及和启蒙思想完全相对立的保守派思想家伯纳尔和梅斯特尔。我们不久就会在有关孔德的论述中看到，这些思想家有时完全对立的见解是如何孕育孔德的社会学想象力的。

三、来自变动社会的推动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论及了从古代希腊到19世纪初叶西方社会学所继承的主要的思想遗产。但是，仅有思想的材料还烹饪不出社会学这道现代大餐。现在缺的是“火候”，即时代或历史的造就。否则我们就解释不了为什么人类对自身社会的思考不是在更前或稍后，而恰恰是在19世纪上半叶结出了社会学这颗硕果。

围绕社会学的出现，先前的学者们已经作了许许多多的思考：美国社会学家D.P. 约翰逊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①。我们已经提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

① 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8页。

“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 18 和 19 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①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因此，欧洲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②最后，瑞泽尔将导致西方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纳为六大方面，这就是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变迁以及科学的成长，显然，这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说辞。此外，斯温杰伍德还提出，社会学出现于 19 世纪是因为此时产生了一批为数不多但十分重要的阅听人。^④

如果对社会学出现的社会背景作一番认真的研究，我们能够将上述各种因素归纳成三个主要的方面：这就是发生在 18 和 19 世纪的两大革命、现代科学的成长，以及在革命和科学的双重影响下欧洲发生的急剧的社会变迁。如果用吉登斯的语言，这一切都不过是现代性的不同方面。为了对社会学的出现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上述三大因素及其具体的进展。

首先，我们来看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学诞生的影响。

尽管自 17 世纪甚至更早，欧洲社会就开始了现在被称作“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历程，并通过这场绵延数百年并不断向整个世界辐射的大变迁使人类生活于其中数千年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公认的这场大变迁的“震中”却是 18 世纪欧洲的两次大革命：一次是发生在 1789 年并横亘整个 19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另一次则是肇始于 18 世纪中期的英国、到 19 世纪中叶在西方各国普遍完成的工业革命。这两次大革命既推动了西方世界的现代

① Giddens, A.,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Pr. Ltd., 1982, P. 46.

② 1998 年美国社会学家巴特也以与我们十分类似的口吻说道：“应该牢记的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最初浮现，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跃升的一种反应。”(Baert, Patrick, *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04.)

③ Ritzer, G., *op. cit.*, PP. 6—9.

④ 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 26 页。